

# 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史研究(第一期) 课题推进会暨“中国与中亚交往 新形势”研讨会会议综述

宋丹萌 刘 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征程中,领导中国对外工作战胜许多艰难险阻,办成不少大事要事,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走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期间,中国与中亚友好交往取得了突出成就。中国与中亚的交往历史悠久,往来频繁,促进了各自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成为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文明交往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五国独立后,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中国交往愈加频繁和广泛,中亚成为中国周边第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全覆盖”的地区,也是“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首倡之地和早期成果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双方续写了古代“丝绸之路”千年交往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正在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基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重大创新项目——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史研究(第一期)(2023YZD059)。该项目旨在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研究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史,探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服务中央决策和外交大局。

2024年7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史研究(第一期)项目组支持的“中国与中亚交往新形势”研讨会在京召开。此次研讨会围绕中国与中亚未来合作、中国与中亚五国机制、2025年中国—中亚峰会展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力求通过研究中国

---

\* 宋丹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国际研究分馆馆员;刘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与中亚五国交往现状的优势和不足,探索双方互动的一般路径,寻找交往的内在规律、趋势和前景,以期对未来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更多对策建议。该研讨会由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主持,相关专家学者以及课题组成员共二十余人出席。

此次研讨会共分为三个议题。在“中国与中亚未来合作前景与重点领域”为议题的研讨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丁晓星用稳定、发展、多元、团结四个词概括了中亚近两年的总体形势,同时指出中亚地区也存在着政局、安全、外交、环境上的风险。他认为,中国与中亚合作的三十余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三个全覆盖”,中亚地区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区。而在未来发展中最关键的还是要以平等、互信、开放、合作的理念推动地区稳定和发展,推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稳步向前。中国要坚定支持中亚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支持中亚地区一体化。同时,要加强理念对接,积极向中亚国家宣传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与中亚国家做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在经济合作上,一方面要做好大项目,另一方面还要做一些小而美的项目,尤其在产能合作方面要注意环境问题,防止外部势力的挑拨抹黑。在人文合作上,要推动更多中亚国家学生来华留学,推动中亚国家对华免签,以促进旅游、人文交流,在中亚发出中国声音,破解“中国威胁论”。在安全合作上,要同时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亚地区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务实推动中国—中亚机制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进认为,目前,整个欧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也在发生非常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便显得更加重要,在这个新的调整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近几年欧美国家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非常迅速,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抓紧时机与中亚国家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否则可能要面临更多来自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挑战。面对欧美国家愈来愈激烈的地缘竞争,中国与中亚既需要从国家层面、智库层面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在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睿思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在人文领域的合作,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人文合作的总职责和总任务,站在更高的角度明确人文合作要达到的目标。通过人文合作筑牢民间友谊,从而为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保驾护航。同时要结合全球文明倡议,让中国

和中亚人文领域合作成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典范,进而为其他地区合作起到示范作用。

北京大学中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施越分享了对中亚地区实地调研的三项发现。一是在中亚地区的中资企业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招工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可以给本地人带来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民心相通,对于塑造中国形象起到较大作用。二是中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大,道路、电网都有提升空间,同时中亚各国经济也在非常积极地向新能源转型,因此,中资企业在基建领域拥有比较多的发展机会。三是中亚地区新能源汽车需求突飞猛进,这有利于中亚国家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同时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经贸项目带动安全合作机制,从具体的、较大的经贸项目入手,慢慢开始推动部门间合作,最后形成多边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可以推动本币互换,逐渐用本币互换推动“去美元化”,更好地保障中资企业的运作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贸易。在人文合作领域,可以通过建立培训机制、挖掘民心相通的故事来推动国际传播,夯实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民间基础。但也要看到,中国目前对跨境腐败打击能力不足。这要求中方建立健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反腐败法律和政策;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和管理,确保企业在国内外经济活动中的合规性和诚信度;建立良好国家形象,推动合作可持续发展。

在关于“中国与中亚五国机制建设”的议题研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苏畅对中国—中亚机制的智库建设提出了几点思考。首先,需要在机制建设方面设置中国—中亚机制的研究专题,避免机制建设的空谈化和工具化,研究的重点要分层次、分领域。分层次主要体现在战略层面,要统筹思考中国的短期、中期、长期地缘战略,同时在实施层面着重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维护好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如何防范“颜色革命”,要研究当前中国与中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机遇和挑战。分领域则是要把重点放在经济 and 人文领域,深入和细致研究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同时推动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人文合作和民间友好,以此助力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并为存在的问题寻找新的思路 and 办法。其次,要发挥好智库的外宣职能,针对重大的问题发声,发挥地方学术机构和高校的作用,推动将智库建设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政府、企业、民间交流的平台。再次,加强与中亚国家智库的合作交流,与中亚国家的学术界进行更深入的学术合作,推动跨领域研究合作。最后,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

治、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青年、媒体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

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副秘书长许昌志针对中国—中亚机制建设提出三点建议。他认为,首先,需要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与上海合作组织相比,中国—中亚机制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很少,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引领、主导作用。其次,要进一步增强塑造能力。开展国际合作就像对施工队进行工程化管理,要形成设计、施工、验收的闭环,而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个领域分头搞”。最后,要进一步拓宽战略视野。一方面要避免地域过于局限,拓展与中亚开展合作的省市,而不仅仅局限于新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在促进经贸、人文合作的同时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可以在执法安全合作、应急管理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防务安全合作。展望未来发展,让中国—中亚机制成为中国与南高加索国家合作、与欧亚其他国家合作的样板。许昌志认为,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合作投入大、收效慢、成效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三个方面。中方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指导下,开放包容,求同存异,这样才能为人文合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分析了欧盟、日本与中亚地区的合作方式,认为欧盟在中亚建立了层次最丰富的会晤机制,国家间分工明确,推动了很多小而实、重民心的项目落地,并且善于把握合作方向,在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问题等方面积极与中亚国家展开合作,同时注重打造与中亚国家的数字联通、物流联通和能源联通。而日本对中亚政策的地缘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试图配合美国、欧盟、韩国政策,以自由开放的中亚为抓手,并借此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地缘竞争。具体措施包括:与吉尔吉斯斯坦签订稀土开发协议、推动日本支付系统进入中亚、提出“高素质人才培养”“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口号等。中国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借鉴有益经验,提高自身竞争力。中国与中亚国家拥有高度的政治互信,在合作过程中中方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优势,促进贸易往来,加强交通物流建设,形成立体化的、全面便捷的物流网,发挥产能和技术优势,推动中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并在盐碱地治理、泛区农业等方面开展更多合作。他建议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过程中,明确参与各省区市的分工,让东部地区更多地负责贸易和投资,新疆等西部地区则以人文合作为主,并以康养、医疗合作作为与中亚合作的抓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宁对中国—中亚合作

机制大趋势作出判断,认为现在中国和中亚各国进入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是中国和中亚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好合作时机。俄罗斯影响力下降造成了中亚地区力量格局变化,带动中亚国家与中国合作需求的增加,这既是机遇期也是窗口期,中国要把握好机会。在合作方向上要将安全合作放在首位,因为这是与中亚国家合作的短板,中国要把握时机加强军事、执法、司法、边界等领域的合作,同时也要警惕“三股势力”的威胁。而在经济合作上,力求在实体经济合作过程中真正形成指导务实合作的制度和机制,推动中国的理念、标准“走出去”,以此规范和引领中亚国家进入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是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此外,不仅要谈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也要介绍我们在技术创新中遇到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玉明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中国与中亚关系发展,一方面需要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机制下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亚各国的发展道路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多领域合作方面取得示范成果,更好地吸引中亚国家与中国合作,甚至辐射周边地区。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应对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和竞争,坚持道路自信,更好地发挥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平衡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高焱迅介绍了全球化叙事向分散化、集团化方向演进对中国与中亚合作的影响,认为国内外学界对全球化叙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认识。首先,和平叙事逐步消失,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财政资金投入军事及其他安全类项目上,而地缘政治冲突及新冠疫情也导致了世界经济步入高成本时代。其次,区域一体化叙事不断加强,乌克兰危机后,地缘政治纳入全球化叙事,大国参与的区域组织经贸合作框架代替了世贸组织的合作框架,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由全球转向地区。最后,共性叙事明显减少、大国间的战略互疑、国际行为体对当前政治秩序的不适应以及世界经济增长长时间乏力等客观现象,导致不信任的传统现实主义回归。

在关于“2025年中国—中亚峰会展望”的议题研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会荣认为,尽管当前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中亚地区开展了不少活动,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亚南高加索方向对中国而言还是窗口期。这要求中方转变思路,推动中国与中亚合作走深走实,也要加强地区政策的协调,保证政策、部门、机构之间协调一致,用打组合拳的方式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同时要在绿色经济、创新经济、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等中亚国家感兴趣的议题上提出具体可行的合作思路,让中亚国家通过中国—中亚合作机



制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推动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介绍了中东、南亚、东亚三个板块国家对中亚政策的变化,指出在中东三个国家中,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与中亚增加互动是在“向东看”的背景下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促进对华合作,而土耳其则是想从桥梁国家变成枢纽国家,其对中亚扩大影响更具战略性,也具长期性。南亚地区中,印度 2020 年启动了“C5 + 1”机制,同时非常关注中国在中亚的动向,意在防止中国借助中亚制衡南亚,而巴基斯坦则非常希望与中亚扩大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但受安全形势所累,近年来实质性进展较少。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对中亚的政策愈发具体清晰,日韩一些企业也在加大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企业的沟通与合作,这一方面是为了配合美西方的中亚政策,另一方面也体现日韩两国将中亚作为中转站的政治、经济考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进一步凸显中国—中亚机制的特点和优势,在 2025 年的中国—中亚峰会上,对中亚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给予适当的回应,将双方需求进行有效对接。

与会专家还针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中的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东杰从智库角度和理论研究角度介绍了近期美西方对中亚跨境民族的研究情况。他认为,美国极右翼反华势力和欧盟内部反华势力煽动跨境民族对中国的仇恨,破坏中国与中亚群众民心相通。他建议提前进行针对性部署,组织专门工作组,了解相关情况及其下一步计划,为中方后续开展工作提供有效信息。

孙壮志作总结性发言,他对与会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他表示,此次研讨会不仅关注了历史,也回归了现实。未来要充分利用好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史研究(第一期)这一平台,积极促进研究中亚相关问题的专家学者互动交流,掌握前沿信息,深入、有序地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史研究,高质量完成课题任务,实现预期目标。

国际新格局下的中国、中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 21 世纪上半叶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通过此次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充分交流了中国与中亚合作的现状、重点领域和存在的不足,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并结合中亚国家自身特点的基础上,阐释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的特殊意义,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成就,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合理建议并作出前景展望。

(责任编辑:李丹琳)